

民办高职院校科研行动困境的个案研究*

——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郝天聪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科研是推动民办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 相比公办高职院校, 作为制度化活动的科研并未在民办高职院校推广开来。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 遴选了1所案例学校, 深入探究民办高职院校科研行动困境的根源。研究发现, 民办高职院校科研行动在组织层面受到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的形塑, 效率机制的影响明显大于合法机制, 由于两大机制无法实现匹配, 科研制度安排受到消解; 在个体层面受到制度的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的形塑, 未形成有效的科研激励机制, 导致科研沦为符号般的存在。为走出困境, 应从改善民办高职院校基本办学条件入手, 树立应用导向科研定位, 激发科研内生动力, 从而推动民办高职院校科研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 民办高职院校; 科研行动;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 个案研究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154(2022)05-0072-08

DOI: 10.16851/j.cnki.51-1728/g4.2022.05.005

一、问题的提出

民办高职院校是公办高职教育的重要补充, 也是高职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截至2021年9月30日, 全国共有高职院校1,486所, 其中民办高职院校350所。^[1]但整体来看, 与公办高职院校相比, 民办高职院校竞争力普遍偏弱, 办学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表现为招生困难^[2]、优秀师资力量短缺^[3]等。21世纪以来, 教育部先后推出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和特高校建设项目等, 通过财政专项资金来推动高职院校的发展。但除了极少数民办高职院校外, 绝大部分民办高职院校并未获得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 其与公办高职院校之间的差距呈现拉大趋势。

2021年10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高职院校而言,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都可能影响高质量发展大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 被看作是高等教育的四大功能。^[4]与其他功能相比, 科学研究往往被看作是高职院校的短板。长期以来, 高职院校受关注较多的是其知识传播功能, 其知识生产功能并未得到广泛关注。既然高职院校是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同样不可忽视其知识生产功能。高等性是无法与研究分离的, 离开了对相应知识的探索、表达和传递, 就不会有真正的高等教育, 阻碍高职院校高等性的重要因素是研究的缺乏。^[5]没有扎实的科研做基础, 将很难支撑起高职院校的高等性。高职院校要走出目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一般课题“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的职业教育吸引力研究”(编号: D/2021/03/167)。

本文获《当代职业教育》第一届主题论文征集及评选活动二等奖, 原文题目《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科研行动困境的个案研究——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作者简介: 郝天聪(1989—),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 职业教育基本原理。

收稿日期: 2022-05-20



前内涵建设的迷惘状态,应该将研究作为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突破口,从“建设”到“研究”,是高职内涵发展范式的转变,只有围绕这一思路才能发展成为真正具有标杆意义的高职院校。^[6]

对民办高职院校而言,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样不可忽视科研的重要作用。然而,相比公办高职院校,民办高职院校整体科研水平更为羸弱,甚至陷入一种行动困境之中。对于造成民办高职院校科研行动困境的原因,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解释,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从教师个体角度出发,将原因归结为民办高职院校教师科研能力不足,^[7]教师科研基本素质不高^[8]等。另一种观点从学校组织角度出发,将原因归结为教学任务繁重、科研条件太差、科研团队缺乏等硬环境不佳^[9]以及科研管理氛围、科研学术氛围、科研文化氛围不浓等软环境不足^[10]。上述研究对于分析民办高职院校科研行动困境具有一定解释力,但主要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经验层面。这种经验层面的探讨可以为深度挖掘造成困境的原因提供一定指导性,却未必切中问题本质。鉴于此,本研究试图借鉴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对造成民办高职院校科研行动困境的原因展开溯源性分析。

二、理论框架

根据学科研究视角的不同,可以将制度主义理论划分为三大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11]由于各自所依赖的学科基础不同,导致其理论框架、关注重点等有较大差异。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历史”和“脉络”,关注有意义行为和结构脉络的相互作用,第一个特征是以制度模式和形态为焦点解释社会现象,第二个特征是将制度视为历史的产物。^[12]虽然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可以为本研究提供重要的背景基础,但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制度产物并非本研究的关注重点,很难以此为依据开发一般化理论以及对个体的微观行为进行解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研究对象为经济现象、政治现象等,在解释制度的起源、效果以及稳定和变化时将焦点放在谋求效应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之上,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最

重要的特征。^[13]但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同样存在缺陷,它将行为的发生机制过多地归咎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常常忽略个体行为选择中的非正式制度,也缺乏对权力关系的关注。实际上,个体行为机制并不仅仅受到理性的驱动,如果缺乏对微观层面非正式制度的关注,那么将很难理清民办高职院校的科研行动机制。

在人的存在里,人的社会存在是关键的一维。所以社会学反复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人之为人有何意义,作为具体情境里的人又有何意义。^[14]相应地,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要解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批判理性选择模型,强调认知、文化层面,关注作为自变量的制度和不适合以个体行为的简单加总进行解释的超个体分析单位。^[15]而且,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看来,人类活动会经历从惯习化到制度化的演变过程。所有人类活动都会受到惯习化的影响,任何一种活动只要不断地重复就会形成一种模式,后者可以较为经济省力地进行再重复,并可被行动者所理解;惯习化的意思表明,正在谈论/当前的行动在未来正好可以按照相同的方式同样省力地去操作;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存在与各种类型行动者惯习化的行动相应的典型化(定型化)行动,就可以说制度化已经出现。^[16]相对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对于解释本研究中的研究问题更具有适切性。从本质上来说,民办高职院校的科研行动问题,也是一个社会行动问题。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切入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理清民办高职院校科研行动背后的逻辑。对行动者而言,其行动往往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内在地遵循着一定的行动逻辑,并发挥着特定的功能。

回顾社会学制度主义流派的发展历程,它经历了从旧制度主义向新制度主义的演进之路。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制度主义理论的关注重点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与社会学旧制度主义相比,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典型特征如下。其一,强调应该将分析单位放到组织场域层面,关注组织场域所处环境的影响



力；其二，关注组织外围的假设、象征和意义体系，尤其关注制度的认知层面；其三，重视社会现象的宏观层面和围绕个人行为的、日常的、理所当然的假设；其四，关注个体对社会的认知以及与此相关的意义体系和象征体系的影响力。^[17]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中，备受关注的主要有两大流派。早期代表人物以迈耶（Meyer, J.W.）和罗文（Roman, B）为代表，二人将新制度主义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他们将制度看作是一种文化性规则复合体，认为组织结构会受到制度环境变迁的影响，这是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流派形成的重要标志。他们提出，必须从组织所处环境的角度去解释各种行为与可能产生的现象，组织环境可以分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技术环境主要遵循效率机制，而制度环境主要遵循合法性机制。^[18]斯科特（W. Richard Scott）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斯科特认为，组织中的个体往往受到三种制度基础性要素的约束，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19]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前人对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等正式制度的关注，斯科特关注了文化—认知性要素这一非正式制度。

尽管以上两种分析框架提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流派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关注的重点和面向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并非没有融合的可能性。民办高职院校科研行动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性活动，其复杂性不仅在于会受到组织科研制度供给的影响，还在于个体对科研制度感知的差异。组织层面的集体科研行动，也会无形之中对教师的个体科研行动产生影响，从而共同塑造民办高职院校科研行动的全貌。如图1所示，在同一组织场域下，两种分析框架分处不同的层面，通过组织实现中介关联，即组织本身所承受的外部制度压力，会以不同形式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传递到个体身上，并对个体科研行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迈耶、罗文分析框架关注的重点是组织的集体行动问题，直接分析的是组织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

技术环境，并以此为基础去分析组织的行动机制。本研究旨在借助迈耶、罗文的分析框架，从民办高职院校所处的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出发分析其科研制度供给状况。而斯科特分析框架关注的重点是组织内的个体行动问题，直接分析的是组织内个体在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感知约束下所自觉实践的科研行动。本研究旨在借助斯科特的分析框架，从制度的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出发，来分析教师的科研制度感知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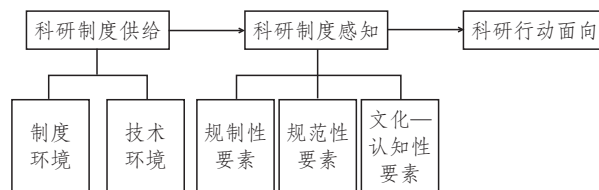


图1 民办高职院校科研行动分析框架

三、研究方法

结合前述分析框架，本研究主要采用个案研究方法。个案，是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选取出来的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个别案例（个人、人群、组织、社区、事件等）。^[20]作为案例研究法的主流方法，个案研究可以通过亲临现场，深度挖掘关于个案的信息，呈现更丰满的分析，甚至展现个案不为常人所熟知的一面。本研究选取的个案S校是A直辖市一所民办高职院校，创办于1993年，该校还是首批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面向全国招生的全日制民办非营利高职院校之一。S校虽然地处全国经济发达的A直辖市，但是无论是在地方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并不具有竞争优势。A直辖市虽然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整体较高，但相比中职，高职一直是其短板所在。而且在A直辖市所有高职院校中，S校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势。虽然S校归A直辖市教委管理，但由于其民办身份的存在，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得到的优质资源仍然十分有限。基于分析框架，本研究开发了相应的访谈提纲，并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进入现场展开深度访谈，共计访谈了5位专业教师，将其分别编码为S1、S2、S3、S4、S5。每次访谈时间在0.5~1小时之间，并在征求访谈对象同意的前提下进行了录音。而后，研究者对录音进行



了文字转录,形成3万余字的访谈原始文稿,并借助NVivo11软件展开编码分析。

四、研究发现

(一) S校科研制度供给

1.制度环境:另一个世界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S校与公办高职院校的不同,那么可以用“另一个世界”来表示。由于民办身份的存在,使得S校被排除在各种计划、项目之外。即便是不少公办高职院校已经日益重视学校的科研工作,但是在民办高职院校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甚至可以用“作为符号般的存在”来形容。

“据我所知,大部分公办高职院校都制定了相应的措施,系统推进学校的科研工作。但是,多数民办高职院校对科研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包括我们学校,科研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民办高职院校关键是能把学生招进来,并能送出去就行了,不去关注科研。”(S-1)

在现有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格局下,资源分配已经趋于固化。在激烈的资源竞争过程中,与公办高职院校相比,S校注定不占优势。无论是在项目申请,还是在各种奖项的评选方面,公办高职院校都占有绝对的优势。相比之下,S校对科研的重视程度并不高,也不会热衷于追求各种类型的排行榜,而是会更加注重投入和收益。

“民办高职院校相对于公办高职院校,办学条件更差,基本不考虑科研职能,也不会在乎各种排行榜。实际上,很多高职院校做科研主要是为了拿项目。但是,我们学校没有这个条件,也争取不到,没法跟那些好的公办高职比。”(S-2)

而且,这位专业教师还提到,做科研关键在人。但是,从学校现有的师资队伍构成来看,兼职教师占有相当比例,缺乏优秀的师资,应付基本的教学已经不容易,能做好科研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与公办高职院校相比,民办高职院校的师资要差很多,甚至可以说是‘杂牌军’。很多都是公办高职院校退休过来的,或者是一些刚刚毕业的‘新兵’。由于教师流动性高,学校每年会引进一些

新老师,还有很多是兼职教师。所以,这种情况下,学校没有条件支持教师做科研,主要任务还是把教学做好。”(S-2)

2.技术环境:招生与就业的双重压力

与公办高职院校相比,S校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更为严峻。其突出表现是,S校要同时面对来自招生与就业的双重压力。在办学基础本来就较为薄弱、各高职院校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S校近年来的招生与就业压力越来越大。S校之所以如此重视招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办学经费的紧张。由于是一所典型的公有民办非营利性高职院校,学校并没有太多的“创收”。除了教委划拨的生均拨款外,基本运行经费则主要来源于学费。

“我们学校是公益性质,即非营利,所有的收入都用在师资、设备、校园建设上,但是学校毕竟得靠招进学生来才能做得更大和更好。主要的经费来源是学生学费,只要招生多了,这个学校壮大肯定是有机会的。像实训大楼都是靠学生的学费来建的,其实学校没有创收的营利压力,企业老板办的高职可能更看重利益。如果学校是完全公办的,不会太考虑招生问题。教委会划拨一些钱给我们,但不是很多,相对于庞大的开支来说,学校压力很大,我们教师的工资水平也是很一般,所以对通过招生收学费的依赖性很强。”(S-3)

面对招生压力,学校也会想尽办法来扩大招生来源。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个做法就是中高贯通。

“我们老师虽然不用去外省招生,但是系主任一直在做招生工作,生源压力也是很大。最近几年,我们就想办法扩大招生来源。我们有些专业在民办高职里开办比较早,也比较有特色的,所以会寻求一些中高贯通项目,主要是跟中职合作做‘3+2’的衔接项目。”(S-1)

对S校而言,除了招生压力之外,就业压力也是不可小觑。如果招进来的学生找不到好的工作,那么同样会影响学校的名声,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增加学校的招生压力。与公办高职院校相比,S校来自就业的压力显然相对更高。

“对我们民办高职来说,只有好的就业,学校





的牌子才能闯出去。如果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能找到好的工作,那么人自然而然就多了,有了更多的生源学校才能办得更好,这是学校立足的一个根本。如果哪天因为就业不好,招不来学生,那学校也很可能会倒闭。相对来说,很多公办高职不太担心这个问题,他们的就业压力没那么大。”(S-1)

在招生与就业的双重压力之下,S校显然没有将更多精力放在科研方面,也很难为教师提供科研软硬件的支持,科研在S校的“符号”特征由此被进一步放大。

(二) S校科研制度感知

1. 规制性要素:成为鸡肋的科研

作为一所民办高职院校,与公办高职院校相比,S校在组织架构上存在明显不同。在进入S校之前,研究者曾试图联系该校的科研部门,但是通过多方查询发现,该校并没有专门的科研处。由于重视程度并不高,学校相关科研事务挂靠在教务处,并由教务处直接组织管理,代理相关科研事务。对于S校来说,其科研工作整体处于起步阶段,甚至沦为“鸡肋”般的存在。一方面,S校对教师工作量的考核重点在教学,而不在于科研,科研基本上处于一种无要求的状态。

“我知道有些学校他们是对教师岗位进行了分类,让一部分教师去做科研。我们学校没有通过分类让教师专门做科研。岗位类型基本是教学岗和行政岗的区别,学校的核心任务是教学,科研好像不在考核的范围。”(S-3)

另一方面,教师在评职称方面,科研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主要考核的仍旧是教师的教学业绩。只有在教学业绩同等的情况下,科研的优势才能稍微有所体现。

“我们职称评定对科研是没有硬性要求的,主要看你的教学业绩,不怎么看科研。职称评定必须要有高校教师资格证,学历得达到要求。比如说讲师,要求是硕士研究生学历,然后发表普通期刊论文就行。如果要评副高的话,科研要求也不高,有核心论文和课题就行。但是能不能评上副高,关键还是看你教学能不能做好。这里评职称竞争不大,

但是符合条件的教师也是屈指可数。两个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有科研的经历,或者有科研成果,你肯定是优先的。但是如果说人家这边经历比你长,那么科研就不一定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了。”(S-4)

而且,S校并没有出台相应的奖励措施鼓励教师做科研。在缺乏激励的情况下,很少会有教师将精力投入科研。

“做科研实际上也需要学校层面的激励,但是目前我们学校对科研激励基本是没有的,自然专注于科研的教师也不多。至少我没太感受到,所以也没怎么去做过,身边的人好像做得也不多。如果你是提前立项的,那么我们在经费方面,学校会有相关的配套,会有一定的经费报销。”(S-J-1)

此外,与公办高职院校相比,S校在科研条件上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突出表现在缺乏科研平台、科研团队和科研经费支撑等。

“我们没有像样的科研平台,做研究可能会受到一些平台的限制。我觉得跟企业真正合作科研,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完成的,也需要一个团队去攻关。个人下企业对接肯定是不行的,解决问题肯定要一起来,一是跟他们融合,二是我们自己也能组成一个团队跟他们共同协商。我们现在的团队基本上是以教学为核心组建的,不是以科研为核心。我们也不会跟企业对接,这种科研项目基本上没有钱。”(S-3)

2. 规范性要素: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相比公办高职院校,S校教师的归属感、安全感和幸福感都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教师都存在“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状态,能够有精力做科研的教师少之又少。作为一所民办高职院校,S校的吸引力显然没有公办高职院校高,尤其是无法吸引优秀人才来校任教。即便国家层面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企业优秀人才到高职院校任教,但是在访谈对象看来,在短期内民办高职院校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做科研根本上还是要靠人,比如说有的人研究能力非常强,对研究的东西进行成果转化能力也





特别强,还可以把研究的东西教给学生,但是这种优秀的人才不会来我们民办高职院校。有些行业技术好的人才基本上都待在企业了,不愿意来学校,因为在企业收入是非常高的。相对来说,学校在收入方面的吸引力就差很多。”(S-3)

由于S校所处的A直辖市房价、物价水平极高,教师群体普遍感觉生活压力较大。在有限的工资水平下,除非有利可图,否则,很多教师并不愿意对科研投入足够多的精力。

“在我们学校,做科研的话得不到多少好处。带学生参加比赛,收益可能会比这更高。因为毕竟在这个大都市,说句实话,除非‘家里有矿’,不然生活压力都很大。我们学校的基本工资并不高,在高职院校里是一般中等水平,大概能有个五六千。本地很多中职学校的工资水平要高些,所以很多人宁愿去中职当老师。”(S-1)

另外,由于民办高职院校无法提供编制,导致S校教师的流动性相对更高,师资队伍具有诸多的不稳定性。即便是留下来的教师也没有安全感,甚至有很强的危机感。

“在我们学校,教师流动性是非常高的。主要问题是自己的生活所需与学校的供给之间存在矛盾,工资达不到平均水平。更主要的问题是,教师没有安全感。民办高职院校毕竟没有编制,大家都考虑退休了以后怎么样,很多离职的同事都去了公办高职。”(S-4)

3.文化—认知性要素:教学能做好就不错了

与公办高职院校不同,S校有着相对更为完善的教学督导制度。在与几位专业教师的访谈过程中,被访谈者都提到了这一制度。教学督导制度不仅深刻影响S校的基本运作,而且也影响S校专业教师的行为规范。

S校对教学督导制度的设计与坚决执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教学质量的参差不齐。与公办高职院校不同,民办高职院校吸引力明显不足,真正科班出身、具有师范背景的教师比例并不高。为了保证基本的教学质量,S校返聘了大量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专家型教师,以发挥其对教学质量的提升

作用。

“我们学校有一个督导机构,教学督导人员都是年龄比较大的返聘教师,一般的公办高职院校好像没有。我认为这个部门肯定是要有的,因为尤其对于刚毕业的新人,不是师范毕业过来的,教学基本功还缺乏。在这种情况下,督导机构可以帮助我们青年教师成长,一些不太成熟的、不太合理的地方,需要指正。”(S-4)

在日常的学校运行过程中,教学督导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与很多公办高职院校教学督导由行政人员担任不同的是,S校教学督导的专业性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们每一学期都有督导听课,就是督导会听每个老师的课。教学督导很有教学经验,比如我们系的督导,在听课的时候会把你的缺点说出来,跟你说得很直接。我们目前的督导是有专业背景的,所以他能听出来你哪个地方有问题。”(S-5)

实际上,S校教学督导制度的存在也让教师感受到切实的压力,这种来自教学考核的压力要远远大于科研。相比之下,S校教师并没有对科研产生真正意义的认同。

“相比科研,教学才是真正的压力,教学的工作任务其实是比较重的,学校对教学事故处罚很严重。而且,我们学校教学督导很有经验,他们有可能随时会来听课,看看你授课的方式,对于课堂的把控,学生在课堂上的一个状态等,这些都会给老师们带来压力。我觉得这个督导是有必要的,但是可能还是要给老师多留一点空间。因为每个老师最需要的就是尊重。”(S-1)

五、结论与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科研在民办高职院校整体办学实力提升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民办高职院校科研仍旧存在行动困境。为深入解释民办高职院校科研行动困境,本研究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探讨S校在特定组织场域下的行动选择。

研究发现,就组织层面而言,S校科研行动受到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的双重形塑。制度环境主要受合法机制的约束,高职院校为了获得高等教育身





份,大多采用相似的科研制度安排。然而,相比公办高职院校,S校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由于民办身份的存在,S校与很多项目、奖项无缘,也不会过多关注各种排行榜,无法与公办高职院校竞争。S校甚至没有专门的科研处,与科研相关的事务由教务处代理,这反映了S校甚至不愿为保持基本的“合法性”而努力。如果组织完全基于合法机制运行,那么会出现趋同化现象,但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多的教育组织开始考虑技术环境因素。迈耶、罗文将教育组织定义为“强制度环境、弱技术环境”过于简单和静止化,教育系统从一定意义上已不再是强制度环境和弱技术环境的组织。^[21]技术环境主要受效率机制的约束,高职院校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会从现实条件出发做出行动选择。在效率机制下,高职院校会评判对科研制度安排进行扩散的条件,甚至会根据需要进行制度消解。对S校而言,学费是重要的办学资金来源,招生被看作是学校的“生命线”,就业不好反过来也会影响招生。由此,解决招生与就业问题更像是“雪中送炭”,而科研问题始终停留在“锦上添花”的层面,S校很难对科研给予足够重视与投入。

就个体层面而言,S校科研行动受到制度的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文化—认知性要素的形塑。从对规制性要素的感知来看,S校在绩效考核、岗位评聘、职称评审等环节对科研的考核要求很低,并且未曾出台科研奖励机制。在没有强制要求和激励引导的背景下,S校科研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甚至沦为“鸡肋”般的存在。从对规范性要素的感知来看,不少教师在S校工作抱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没有认识到自身的科研角色。相比公办高职院校,S校教师由于缺乏编制、收入较低,归属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相对较低,流动率也相对较高。从对文化—认知性要素的感知来看,教学被看作是S校的“主业”,教学图式在教师心目中根深蒂固。不少教师将教学与科研视为一对矛盾,认为能把教学做好已经不易,主动从事科研的意识不足。

结合本研究发现,仍有必要探讨破解民办高职

院校科研行动困境的可能路径。一是要改变传统的资源分配机制,完善高等学校分类管理制度,更多采用发展性评价方式,减少“马太效应”的影响,营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改善民办高职院校的基本办学条件,缓解生源危机。二是要明确民办高职院校应用导向的科研定位,引导其利用现有的科研条件,更多地与企业合作开展应用课题研究,致力于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管理与服务等难题。三是要建立专门的基层科研组织,构建制度化、常态化的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引导教师逐渐明确自身的科研角色,认识教学与科研的互动作用,激发教师从事科研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名单[EB/OL].[2022-05-10].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A03/2021110/t20211025_574874.html.
- [2]郭建如.理想导向政策,抑或蓝海战略?——民办高职办学形式创新政策的可行性与路径选择探析[J].教育学术月刊,2015(9):42-49.
- [3]徐京波.生源危机下民办高职院校的生存逻辑——基于上海X校的个案考察[J].教育学术月刊,2013(9):56-60.
- [4]赵沁平.发挥大学第四功能作用 引领社会创新文化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06(Z3):9-11.
- [5]徐国庆.高职教育高等性的内涵及其文化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1(10):68-70.
- [6]徐国庆.“研究型”是建设高水平高职的突破口[N].中国青年报,2019-01-14:5.
- [7]谢炳清.民办高职院校教师的科研能力[J].教育与职业,2013(29):69-70.
- [8]钱静,胡大文.民办高职院校科研管理的困境与出路[J].职业教育研究,2013(1):66-67.
- [9]朱晓峰,高创宽.民办高职院校科研现状调查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21):36-38.
- [10]沈坤,王兴.科研软环境对民办高职青年教师科研素质的影响研究——以浙中G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1):35-38.
- [11]Peter A. Hall,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J].Political Studies, 1996(5): 936-957.





[12][13][17]河连燮.制度分析:理论与争议(第2版)[M].李秀峰,柴宝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1,36,16.

[14][美]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8.

[15]Paul J DiMaggio.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M].Cambridge: Ballinger Pub. Co., 1988:3.

[16][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M].汪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6.

[18]Meyer, J.W., Rowan, B.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t Structures as Myth and Ceremony[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2):340-363.

[19][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M].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8.

[20]风笑天. 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39.

[21]吴重涵,汪玉珍.制度主义理论的新进展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J].教育学术月刊,2008(2):3-9.

责任编辑 徐春梅

A Case Study on the Dilemma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on in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ical Neo-Institutionalism

HAO Tianco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Scientific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owever, scientific research as an institutionalized activity has not been popularized in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mpared with public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ical neo-institutionalism, this study selected one school as a s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root causes of the dilemma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on in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found that the institutional and technical environment shape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on of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and the impact of the efficiency mechanism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legal mechanism. Due to the inability of the two primary mechanisms to achieve a match, the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rrangement was dispelled.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t is shaped by institutional-regulatory, normative and cultural-cognitive elements, and the effective incentives for research are not formed, resulting in the reduction of research to a symbolic existence. In order to solve such problems,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start by improving basic school conditions, establishing application-oriente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research in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on; sociological neo-institutionalism; case study

